

台東地區史前文化的詮釋與檢討

劉益昌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學士



【經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考古組主任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

私立佛教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兼任教授



【現任】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考古學門召集人

中央研究院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合聘研究員兼執行長

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古蹟與歷史建築審議委員會委員



【著作】

1. 石璋如、劉益昌，《大馬璘》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7。
2. 劉益昌，《台灣原住民史 史前篇》南投：國史館台灣省文獻館，2003。
3. 劉益昌、顏廷仔，〈雲林縣麥寮鄉雷厝遺址試掘報告〉《田野考古》8(1/2): 95-122 (2004.7)。
4. 劉益昌，〈台南縣麻豆鎮水堀頭遺址試掘及其意義〉，《南瀛文獻》第四輯：6-21 (2005.9)。
5. 劉益昌，《九十三年度坪頂遺址內涵研究與坪頂社區文化產業規劃計畫第一階段考古遺址與內涵研究計畫報告》，雲林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之研究報告，2005.7.31。

【授課大綱】

台東地區史前文化的詮釋與檢討

- 一、 考古學與台灣人類活動史研究
- 二、 史前文化發展變遷與檢討
 - (一) 史前文化層序建構
 - (二) 史前文化的傳承與變遷
 - (三) 時空架構建立的思考
- 三、 當代學術界關切的課題
 - (一) 考古學與南島族群研究的幾點看法
 - (二) 台灣歷史的考古學研究觀點
- 四、 從台東檢討的史前文化觀點
 - (一) 遲滯與地方性演化
 - (二) 移動方式的變遷
 - (三) 文化的互動方向
 - (四) 儀式性與日常生活
 - (五) 交換網絡與影響圈
- 五、 進一步的研究思考

【推薦參考書目】

(見文後)

台東地區史前文化的詮釋與檢討

劉益昌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人社中心 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執行長

一、考古學與台灣人類活動史研究

考古學是研究過去人類文化與歷史的一種方法與學科，這個學科最大的特色在於擷取基礎資料的方法，考古學研究的第一手資料來自於過去人類生活而且埋藏在地層中的遺留。透過考古學田野工作中的調查、採集以及發掘等方法，有秩序的取出遺留在地層中的遺物、遺跡以及遺物、遺跡之間的相互關係等資料，這也是外界人士對於考古學的最大印象。其實除了發掘工作之外，考古學的實驗室分析也具有特殊的意義，由於人類行為所影響的層面相當廣泛，因此實驗室所需面對的標本也就相對複雜，往往在考古學研究或教學單位中具有各種不同的實驗室，例如地質考古實驗室、生態考古實驗室，而且通常考古學者還需要跟其他不同學科的學者進行合作，或得到其他行界學者的支援。

台灣現生的原住民族南島民族是全世界唯一分布在海洋區域為主的人群，民族（或族群）可以從語言、文化以及體質等不同面向進行分類與界定，每一種方法都有其意義。語言學得以對現生或留下語料的人群加以分析，建構其精準的分類體系，不過離開了現生的人群，語言學者就很難針對更早的人群加以分類，體質方面除了現生人類的生體計測與生物人類學研究之外，也可以透過過去人類所留下的遺骸進行體質測量或生物人類學的研究，而取得可能比對的資料。就文化而言，除了語言之外，其他的文化要素也相當複雜，人類的文化是一個不間斷的變遷與演化過程，因此南島系民族所留下的文化當然可以透過長期以來民族學者或文化人類學者所記錄的南島民族的文化，研究其文化模式，並追究其文化變遷。當然文化也可以向前追溯到更早的階段，不過早期階段的人類文化除了部分文字記載之外，通常需依賴考古學研究始可獲得。就考古學的研究而言，除了上述早期文化的研究之外，當然也和體質人類學者合作從事發掘出土人類體質與食物攝取、疾病等方向之研究。

南島系民族文字記載的紀錄相當晚出，在台灣地區大致從十世紀開始，擁有外界對台灣本島的模糊記載，從十七世紀二〇年代開始則有較為詳細的記載，當然時間相當短暫，而且紀錄中南島民族並非主體。因此，考古學的研究就成為追溯南島民族早期文化

發展與變遷的重要學科與方法，若要建立南島民族早期的發展與變遷過程，考古學研究可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台灣考古學的研究從 1896 年開始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研究的主體主要在史前時期，歷史時代以來的考古研究與舊社考古學的發展則較為遲緩，史前時期的文化大多數可說是南島民族早期文化的研究，近年來有不少新的發現。不過近年來由於台灣歷史研究的勃興，舊社與歷史時代考古遺址的研究，也逐漸為學術界所注重，因而開啓了歷史考古學研究的熱潮。

台灣東部地區擁有豐富的史前文化，在近世歷史中也擁有多元的原住民族發展歷程，長年以來台灣學術界大多接受史前文化與原住民族關係密切。換句話說，史前文化可能是大多數原住民族的祖先所留下的文化。從此一概念出發，從新石器時代早期以來到當代原住民，可說是一連串的文化發展，其間並無間斷，只是加入一些外來的文化體系。從史前文化與當代文字記錄的整體思考，東部地區都是研究的重點區域，除了史前文化發展的新資料之外，近年來新發掘的文獻資料同時也對此一研究體系具有重要的影響，例如十七世紀荷蘭人所留下的統治紀錄與地圖，就可以使我們重新思考文獻的意義，並且做為史前與歷史過渡階段的重要資料。

二、史前文化發展變遷與檢討

(一) 史前文化層序建構

東部地區史前文化層序的研究，近年來雖經多數學者研究，一再提出修正或新見解（連照美 1996、1998，連照美等 1996，劉益昌 1990，劉益昌等 1994，葉美珍 1997）。但是近年來調查研究工作增加不少新資料（臧振華等 1997，劉益昌、顏廷仔 2000，劉益昌等 2002，李坤修、葉美珍 2001，劉益昌等 2004，李坤修 2005），同時也有許多利用新資料出現後產生的新論述，甚至擴及於海外地區的研究（例如洪曉純、飯塚義之、Peter Bellwood 等的研究工作）。

因此筆者等在 2000 年根據調查所得的資料及分析結果重新檢討，建議東部縱谷及海岸山脈地區的史前文化層序如下表。當然並非最恰當的史前文化層序，其中最大的缺憾是縱谷地區以及中央山脈東側材料極度缺乏，當然綠島、蘭嶼的資料也明顯不足。以目前的理解而言也非只區分為北段、南段進行討論，恐怕需要區分更多的小區域進行討論，並與其他區域連結，才能釐清。不過筆者以目前能夠觀察的資料提出一個相當複雜的文化層序，目的在於說明東部地區史前文化複雜與多元的狀態。

本文擬議之史前文化層序表（引自劉益昌、顏廷仔 2000，經修改）

北段地區	南段地區		年 代
當代原住民族群 巴賽人 「中央山地類型」 普洛灣類型 水璉類型 靜浦類型/工作地類型/Lobusbussan 富南類型 山棕寮類型			A.D.1900 A.D.1620 原住民時代 500 B.P. 1500B.P.金屬器及金石並用時代
平林類型	富里山類型	三和類型	2000B.P.
花岡山文化	麒麟文化	卑南文化	2500B.P. 3000B.P. 3500B.P.新石器晚期
“鹽寮類型”		富山類型	4000B.P.「繩紋紅陶文化」 4500B.P.新石器中期
“小馬類型”			
大盆坑晚期（月眉）大盆坑晚期（芝田）大盆坑晚期（卑南） 中期（長光）			5000B.P. 5500B.P.新石器早期
長濱文化晚期			6300 B.P. 10000B.P.舊石器晚期持續
長濱文化中期？			
長濱文化早期			30000 B.P. 50000B.P.舊石器晚期

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已經指出花蓮台東地區有許多新的文化體系，例如舊香蘭遺址、貓山遺址，不過這些遺址大抵上可以放在上述體系中來思考，例如舊香蘭遺址可能就是原來所稱龜山文化或龜山文化山棕寮類型的一部份，而與三和文化具有密切的發展關係，至於貓山遺址所代表的文化體系，目前雖未有清楚的歸屬（葉美珍 2007），但早期的調查研究已經發現此一文化體系的相關遺址，也許仍與工作地類型具有密切的關連。這些文化體系建構都需要更進一步的資料，未來將進一步修正此一文化體系。

(二) 史前文化的傳承與變遷

1. 東部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來源問題

從最近提出的史前文化層序表及說明中，可知東部地區的史前文化遠較先前所知複雜。早期東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尚不明朗，因此年代較早的舊石器時代長濱文化與後來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晚期的麒麟、卑南之間並沒有演化上的連繫關係（宋文薰 1980）。雖然最近已經證實繩紋紅陶時期文化與大坵坑文化均存在於東部地區，且長光遺址的年代推測可能早到距今 5000B.P.以上，但仍無法看出與長濱文化之間的關係。這也許顯示了東部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可能經過外來移民及文化傳入，而且不只一波傳入。長光可能從更早的八甲類型傳入，卑南遺址的大坵坑文化晚期可能從果葉－鳳鼻頭這個傳統傳入；月眉第二遺址的大坵坑文化目前來源不清楚，在距離上較為相近的無疑是新城遺址（移川子之藏等 1932）。

至於繩紋紅陶時期的移民無疑來自西南沿海及恆春半島（朱正宜 1990），尤其是與鳳鼻頭遺址細泥紅陶期及其後演化的鳳鼻頭文化（包括鳳鼻頭遺址夾砂紅、灰陶期、恆春半島鵝鑾鼻第三文化相同），顯然和漁橋遺址、富山遺址、小馬 I（東河北）遺址等具有密切的相關，這些遺址出土的遺物顯示對於海生資源的依賴與了解，同時說明他們是一群善於海洋活動的族群。他們之間的連絡及移動可能是透過船筏進行。

在繩紋紅陶之後的卑南文化、麒麟文化及花岡山文化，除了麒麟文化仍不明瞭來源之外，其餘兩個文化可能都是從當地的繩紋紅陶演化而來。但三者之間可能有著頻繁的互動及往來。假設文化層序中對於花岡山文化早期及卑南文化早期年代相近的推斷無誤，顯然花岡山文化出現雙豎把罐的比例要高於卑南文化很多，加上卑南文化祖型的“繩紋紅陶文化”和西南沿海的牛稠子文化都沒有帶橋狀豎把或橫把容器的傳統。如從彼此互動的關係而言，顯示帶把器物可能從北向南傳遞。也許就是圓山文化→花岡山文化→卑南文化。

2. 卑南文化的演化方向

很早就有學者主張卑南遺址可能是東部地區原住民阿美族祖先所留下的遺址（鹿野忠雄 1952:164、宋文薰譯 1955:96、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1957:64-65、1979:126-128），連照美教授在多年發掘資料研究之後認為可能與排灣群有關（Lien 1989:190）。由於卑南文化結束的年代（1500B.P.）與民族誌記載的土著族群仍有一千多年時間差距，自難直接予以連繫。較好的方法應當是找尋卑南文化向晚期演化的方向，然後再與民族誌記

載中的土著族群連繫。

以目前的資料而言筆者認為卑南文化的晚期有二個演化方向。一條是往山區移民，適應山地生活方式，例如紅葉、老番社、追分等遺址，在演化成爲三和類型以及中央山脈西側的北葉文化，他們可能是後來排灣族或排灣群（包括排灣族、卑南族、魯凱族）的祖先的一部份，這在家屋型態、墓葬型式及拔牙方式等方面連照美教授已有說明（上引）筆者再提出以下二點說明：

- (1) 卑南文化（至少在卑南類型）少見打製石斧、石鋤的特性，恐怕不是耕作地點在發掘區之外（連照美、宋文薰 1986：130），工具沒帶回來。而是卑南文化人的耕作工具可能是用木質材料製造的工具——掘棍，因此並未保存下來。近代排灣族、魯凱族的鬆土工具就是木製的掘棍。在台灣山地極爲常見的打製石斧（鋤）就罕見於馬里山（Barisan）溪以南排灣族、魯凱族居住的區域（鹿野忠雄 1952：96、宋文薰譯 1955：6）。筆者在隘寮河流域所做的調查與試掘結果也證實這一點（劉益昌 1990b）。
- (2) 排灣、魯凱兩族舊社出土的陶器和北葉遺址發掘的陶器器型及花紋和卑南文化晚期出現的器型，非常接近，筆者雖尚未調查中央山脈東側山區，但確信兩者之間的傳承關係是相當清楚的。而北葉遺址最下層的年代是 2300～2100B.P.之間，恰是卑南文化晚期的年代（劉益昌 1990b）。更加强兩者相互關係的可能性，此時台灣西南部地區並沒有帶有橋狀豎把以及橫把容器的文化傳統。這說明卑南文化人越過中央山脈向西移民的可能。

卑南文化的另外一個演化方向，就是留在原來的平原及海岸台地，這些族群可能就從卑南文化晚期逐漸演變成爲阿美族祖先的靜浦文化的各個地方相，雖然只有陶器型制近似的這個較爲直接的證據（李坤修 1987，朱正宜 1990，郭素秋 1995）。但有以下間接的證據。1.居住地區及環境相同。2.卑南社人口碑說明遺址所在地爲阿美族舊社（河野嘉六 1915：312-316）。3.在語言分類上阿美族及排灣族相當接近，通常都被分在排灣群（Paiwanic）之內，而且可能是在台灣彼此相互分離自立的（Ferrell 1969:26、437、438、443）。4.阿美族、卑南族及排灣化的卑南族（Panapanayan）、一部分的排灣族都有祖先從海上島嶼 Sanasay(綠島)、Votol(蘭嶼)遷移進入台灣本島的傳說（移川子之藏等 1935：263-544、圖 5）。這與前述考古資料卑南文化祖型“繩紋紅陶文化”從西南沿海、恆春半島北上進入東海岸蘭嶼、綠島的情況可以配合，同時綠島、蘭嶼也出現卑南文化，似也說明當時二個海島與台東海岸地區的關係密切。

因此學者推測卑南文化可能與阿美族有關的論點，似也可成立。所以筆者認為卑南文化分別向山區近山地區及平原、沿海區域的演化的型態，適足以說明卑南文化可能演化為今日山區適應的排灣群及平原沿海適應的阿美族的祖型文化。這個說法，雖不一定完全正確，但這可能是另外一個思考卑南文化與現代原住民族群之間關係的方向。

3. 麒麟文化與卑南文化

麒麟與卑南文化的關係，近年來產生了不同的意見（劉益昌 2000c），因此一直是學者亟欲解答的問題。由於這二個文化出土的陶器型式頗為接近，分布的區域也大致相當，因此對於二者之間的關係，仍然存在著諸多的疑問。

但是最近筆者等透過陶類的分析與確認，二者在陶器質地的摻沙成分，分別屬於海岸山脈與中央山脈二種不同來源的陶器特徵，以及陶器罐形器器型和把手特徵不同，或許能夠說明麒麟與卑南文化其實是二個不同的史前文化類型（劉益昌 2000c，劉益昌、顏廷予 2000）。雖然目前對於這二個文化的來源仍然存在著諸多的疑問，但是至少能夠確認其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互動關係。陶類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異，應該都足以說明二者之間的不同。此外對於這二個文化的經濟生活模式、社會組織等的研究，將是往後進一步釐清其間關係的重要課題。

4. 史前文化與族群

在思考史前文化與近代早期原住民關係時，筆者曾建議應以目前所知史前文化最晚階段與歷史紀錄最早之間的聚落進行比對（劉益昌 1995）。目前東部地區史前文化最晚階段的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包括分佈於立霧河流域的十三行文化普洛灣類型，分佈於奇萊平原與台東平原之間的縱谷與海岸山脈地區的靜浦文化，分佈於台東平原及其以南海岸地帶的工作地類型，以及分佈於綠島、蘭嶼的 Lobusbussan 文化。初步的研究資料已經指出普洛灣類型和猴猴人、哆囉美遠人，也就是廣義的巴賽人具有密切的關連。工作地類型極可能與卑南族有關，靜浦文化屬於阿美族的祖先向無疑義，不過阿美族其實是一個複雜組成的族群，實難以直接對應，應當進一步針對分布廣泛的靜浦文化進行詳細研究。至於 Lobusbussan 文化無疑是達悟人留下的祖先，當然較晚才進入東部地區的泰雅族、布農族以及與東部地區僅有少量連繫的南鄒族，大概都只能在中央山地類型文化中尋找可以對應的文化群體。

(三) 時空架構建立的思考

時空架構是一個區域史前文化研究的基礎，雖然東部地區已有長久文化層序建立的基礎，但仍有許多必須進一步增益之處。以下幾項為筆者研究過程中，經常思考的議題¹。

1. 文化的辨認

以筆者的認知而言，文化可以說是一個群體的人們集體成就的表現，這個表現形成足以和其他群體人們不同而可以劃分的特徵，在考古遺留上組或多組帶有這個特徵的器物群，而得以和其他器物群單位劃分，這樣就會形成一個帶有時間性的考古單位

(archaeological unit)，這就是考古學文化 (Willey & Phillips 1958: 22)；類型則是同一個文化內因時間或地區的不同所形成的差異，其型態為一組或多組持續一段時間帶，帶有地方性色彩的器物群 (郭素秋 1995: 5)。不過光是器物群可能還不足以說明，也許需更進一步從生活形態、聚落分佈等層面考慮。因此筆者以下的說明也是依此思考方向。

2. 地域區分

在建立東部台灣史前文化的時空架構時，首先會遇到的問題即是如何界定所謂的“東部”之範圍。筆者主張必須打破以往學界習用的北、中、南、東四大區域，而改以塊狀區域連結的方式加以討論。因為以往如果根據行政區域進行地域劃分的話，宜蘭往往歸屬於台灣北部區域，但事實上在建立整個東台灣史前文化層序時，除了花蓮、台東外，又無法忽略這個地區的重要性。所以說諸如台東平原以南至恆春半島；或奇萊平原以北至和平溪、甚至到南澳地區；或是花東縱谷以西至中央山脈軸線以東等區域的文化，就需格外的予以重視。以往學者再思考史前文化的時空架構時，往往會忽略了邊緣接觸地帶的研究；但事實上，不同邊緣地區的文化，經常是力量最大、隔絕最為清楚的地區。所以諸如花蓮北部與宜蘭的交接處以及台東平原以南與恆春半島的交接處，這些區域的遺址在整個東台灣史前文化架構中的歸屬問題，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

¹這些思考筆者在 1998 年東台灣研究會與史前博物館籌備處舉辦的會議的專題演講中亦曾經提出。

3. 年代間距

以卑南文化為例，雖然連照美教授根據碳十四測定的年代，而認為這個文化的時間深度長達三千年，但是筆者認為人類文化的變動應該是非常快速的，在一個如此悠長的時間深度下，我們是否應該更去思考時間的變異性以及空間上如何區分的問題，如此一來，時空架構的建立才能更為切合歷史變遷的真實面貌。因此多年來筆者主張較為細緻的分類體系，也曾提出此一方面的檢討，就目前史前文化的新資料而言，已可看到此種趨勢。

4. 分類基準

目前學界對於文化遺存的分類標準經常難以齊一。在此援引一九五〇年代宋文薰先生分析圓山文化標本時，曾經提出的見解說明，他認為一群遺物的分類基準應該是根據當群人所使用的遺物分類基準而定。這個看法適與一九八〇年代所謂的民族考古學對單一社會及聚落的研究觀點相互契合。也就是說，當我們嘗試對於不同遺址的文化性質進行分析時，似乎應該將其置於當時整個大的地域或文化群中來考量，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將其文化遺存重歸當時的文化體系下，也因而得以復原當時的社會狀況。

三、當代學術界關切的課題

（一）考古學與南島族群研究的幾點看法

1. 台灣史前時代文化如何可與南島民族文化聯繫

從考古學研究文化的角度進行比對與分析，檢視文化的特徵從晚期文化發展的角度前推至史前文化發展的不同段落。從日治初年的考古學者就關心台灣出土的史前遺物是哪一族所留下，長年以來考古學者採取遺物比對的方法追溯史前文化遺物與台灣原住南島民族之關係，戰後張光直先生更進一步以人與環境互動的關係說明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以採集為主、簡易農業為主的文化體系，同時根據語言學者所擬測的原南島文化的特質認為「最早的原南島語族的老家應該是熱帶的海濱地帶；當時住民的生活已有農業（芋、薯、稻米、粟、果樹），但也狩獵並重漁撈。物質文化中有陶器，有石、木、竹器，有紡織，有干欄屋宇，有樹皮布，並大量使用蚌貝，有發達的船航工業。這些環境上和文化上的特徵都是考古學上可以印證的。」（張光直 1987、1995：176）因此張先生將他所熟悉的大坌坑文化出土器物所衍生的文化內涵，指出大坌坑文化的人們「從事海濱生活、採貝（由海貝的遺骸可知）、打漁（網墜）、打獵（石鏃和獸骨），利用植物纖維（繩

紋、網墜、樹皮布打棒)、可能已有農耕(石鋤、陶器)。這種遺物,所反映的文化內容是在大節上與學者所擬測的原南島語族的文化相符合的,但因材料太少,許多細節知道得不清楚,還不能說把原南島語族文化作完全的反映。……如果大坌坑文化代表臺灣本島內南島語族的祖先,那麼臺灣應該至少是原南島語族的老家的一部分。」(張光直 1987、1995:182) 其後學者至今大多依循同樣的方法進行推論,就考古學而言採取的還是考古文化的年代和器物特徵的比較,以及地理和自然環境因素的考量。(例如臧振華 2000、2001)

「在考古學中,陶器在文化分類和族群辨識上一般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以往在南島民族的起源和擴散這一課題上,也主要是利用陶器的花紋和器形等的相互比較來作族群移動的推斷。但是呂宋島的考古工作顯示,單靠陶器特徵所作的推斷,是不夠的,上述的夾砂紅陶的情形就是一個例子,還必須要從考古文化的內涵中,來分析確認其與南島族群的關連性。」(臧振華 2000:20)

「就南島語的起源和擴散問題的研究而言,最相關的考古資料,莫過於各個相關地區考古文化的時、空架構,以及在此一架構基礎上所能瞭解各個考古文化的內涵和其同時限變異和縱時限發展的關係。……目前學者們所能使用的證據,大都只是陶器、石器等一些個別的元素,或比較其裝飾特徵、或排比其年代,而不能從區域性的時、空整體架構上,來仔細梳理其間的線索。所以,結果是對於同一個問題,學者間因為所使用資料和證據的不同,而產生完全相反的解釋。」(臧振華 2001:258)

2. 台灣史前時代文化何時可與南島民族文化聯繫

從考古學追溯的史前文化發展體系與絕對年代測定的結果,釐清史前時期南島民族祖先的可能源起。就台灣史前文化的發展而言,第一個大的段落區隔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與新石器時代早期之間,大多數台灣的學者都同意長濱文化、網形文化等舊石器時代文化體系並未演化成爲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人群,反而在更新世冰河時代結束全新世來臨之後,持續採用原有生活方式,直到 6,000 年前甚至在局部地區稍晚至 5,500 年前左右才逐漸結束,並可能融入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人群之中。

這二個文化階段最大的區別在於舊石器時代以採集、狩獵爲主的生活方式與新石器時代初期以初期農業、採集、狩獵爲主方式之區隔,除了生活型態之外,當然在人類所製造與使用的器物也有很大差別,石器的製造方式從打製到磨製,日用器具陶器之有

無。其間的變化就時間而言當在距今 6,000 年或稍早，這個時段正是全新世時代海水面從最高點逐漸下降轉變到穩定的過程，也就是地質學者通稱的「台南期海進與海退」的階段。這個時期亞洲大陸東南沿海由於海水面高漲，所以沿著東南沿海的海灣有一群富裕的採集者，他們並未進入農業生活，而以採集海岸資源和狩獵作為主要的生活型態。

3. 史前文化末期與南島民族的關係

確切連繫無文字記錄的史前文化與當代南島民族的關係，當從最晚階段史前文化的發展過程與文化特徵談起。不論如何從考古學已知的證據而言，這些人群都陸續定居在台灣這個物資豐美的大島上，逐步發展各自的文化體系，互相採借融合在台灣發展成複雜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體系，並且逐步發展成為帶有金屬器製造和使用的金屬器與金石併用時代的人群，這個階段文化相貌複雜的程度和歷史時代初期並無兩樣，顯然台灣原住民族群的祖先型文化，至少都在晚近的一千多年以前形成。這樣一個距今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早期到距今三、四百年前歷史時代初期的發展過程，並沒有明顯的間斷，只是加入了部份外來的文化要素，這樣的發展歷程清楚的告訴我們，大坌坑文化是當今台灣文化的一支活水源頭。

台灣現有的兩千多萬人口，大部分是歷史時期以來移民的漢族後裔，另有人口佔少量的南島系民族，卻是漢人移民以前就長住台灣的原住民族，南島系民族原來廣布於台灣各地。由於族群與居住地的對應關係，台灣考古學界通常認為台灣的史前文化是台灣原住民族的祖先所留下來的，但這個說法仍有一些需要澄清之處。大致而言，台灣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及其持續型文化，不能確定是哪一族群的人類所留下的遺留；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史前文化大部分是南島系民族的遺留，最早的「大坌坑文化是台灣的南島語族在公元前 2,000-5,000 之間的具體表現，也可以說就是後者在那個時期的祖先」（張光直 1995:180）；但是新石器時代各階段文化仍在發展分化的過程，很難直接說明是哪個族群的祖先，假使要說明史前文化與原住族群之間的關係，應以年代最晚階段的史前文化為主。

雖然追求一個文化與族群的對應關係，有相當的困難，但是台灣地區史前文化，從新石器時代以來就穩定發展，經過金屬器導入逐漸發展成為已知的金屬器與金石並用的時代，其間僅有部份移民，史前文化的最晚期從距今一千年以內到歷史時代之前，在各地區可說已經逐漸接近歷史文獻記載初期的諸民族或族群單位。因此透過文化內涵、分佈區域、口傳資料及早期文獻等資料的類比研究，應當可以逐步找出各個史前文化與目前原住的南島系民族各族群的關係。

根據十七世紀初期以來荷蘭、西班牙人留下豐富的文獻記錄，漢人的早期文獻，以及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初年日本人的民族學文獻記錄，初步可以說明十七世紀初期以來台灣部份原住族群的分布狀態，當然這個狀態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持續在變遷中，不過這些資料所提供的線索足以讓我們和距今 1,000 年到 400 年之間的史前文化分佈狀態和文化內涵進行對比，筆者曾彙整台灣地區金屬器與金石並用時代文化並與文獻記錄的原住民族群分佈比較（劉益昌 1995），得到部份的初步結果，加上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可以指出北部地區的十三行文化晚期不同地區性類型與凱達格蘭族、噶瑪蘭族、巴賽族、道卡斯族具有密切關連；中部地區番仔園文化晚期與拍瀑拉族具有密切關連，貓兒干（崁頂）文化與費佛朗族具有密切關連；南部地區蔦松文化與西拉雅族、馬卡道族均有重要關連，至於東部地區的靜浦文化無疑是阿美族的祖先所留下來的文化，Lobusbussan 文化與雅美族（達悟人）完全相關。至於山區的史前文化由於研究不多，只能指出二本松文化當與賽夏族有關，東埔一鄰文化與鄒族密切相關。

史前文化與族群對比的工作當然還有很多缺憾，也有很多需要更進一步的資料才能完成，但基本的藍圖與架構正逐漸成形中。這些史前文化後裔的原住民族，雖然祖先已經在台灣地區居住六、七千年以上的時光，但是最近三四百年以來正面臨文化遺失及族群認同的重大危機，例如北部地區的平埔族，從伊能嘉矩的訪問及記錄可知，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大部分仍存在於原部落或鄰近的鄉間，只是從清代中葉開始，他們都逐漸同化於漢人社會，而緩慢消失。

4. 考古學研究顯示的南島民族文化意涵

南島民族在台灣落地生根與海外的遷移，具有與台灣當代文化連繫的重要意涵，也具有與廣域南島民族文化連繫的具體意義。就台灣考古學研究的結果，不但可以追溯台灣本島現生原住民族的祖先，其發展變遷的過程以及與當代原住民族群的連繫，同時近年來大量的研究資料都顯示台灣極可能與南島系民族祖先向外擴散的過程密切相關，與台灣地區關係密切的中國東南沿海與菲律賓北部地區的研究成果，逐漸可以勾連彼此之間的關係，從現有的資料而言，中國東南沿海從距今 7,000 年前後在海岸沙丘地帶形成的文化體系，似乎在 6,000 年前後擴散到台灣地區形成大坌坑文化。在距今 5,000 年前後穀類作物種植的文化體系再度影響台灣，促成大坌坑文化的演變，帶來文化的發展，造成新的文化體系在 4,000 年前後快速發展，人口增加、農業發達，向島內遷移到不同生態區位，或者向島內外尋求相同生態區位繼續發展，這個擴張的過程導致南島系民族快速遷徙，其最大的動力在於農業發達、生產力增加所造成的文化體系發展與擴張。

就目前學術研究所得的南島系民族的遷徙與擴張，與台灣本島史前時代早期文化具有密切關連，其族群遷徙與擴展植基於海洋交通體系，此一體系又與黑潮和其他洋流具有密切關連。族群的遷徙往往不是單一方向，而具有雙向甚至多元方向，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筆者在 2005 年有關 Lapita 文化的研討會中曾經發表論述，指出台灣史前時代重要的族群遷徙及其可能方向（Liu 2005），其說明如下：

台灣史前時代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大坌坑文化最晚階段，以及繩紋紅陶時期聚落數量增加與面積擴大，其背後的意義至少包括了人口增加與聚落遷移，就目前所知繩紋紅陶時期各個文化都已經向外擴大其生活領域，人群遷移的策略至少包括以下二種：

(1) 尋找相同生態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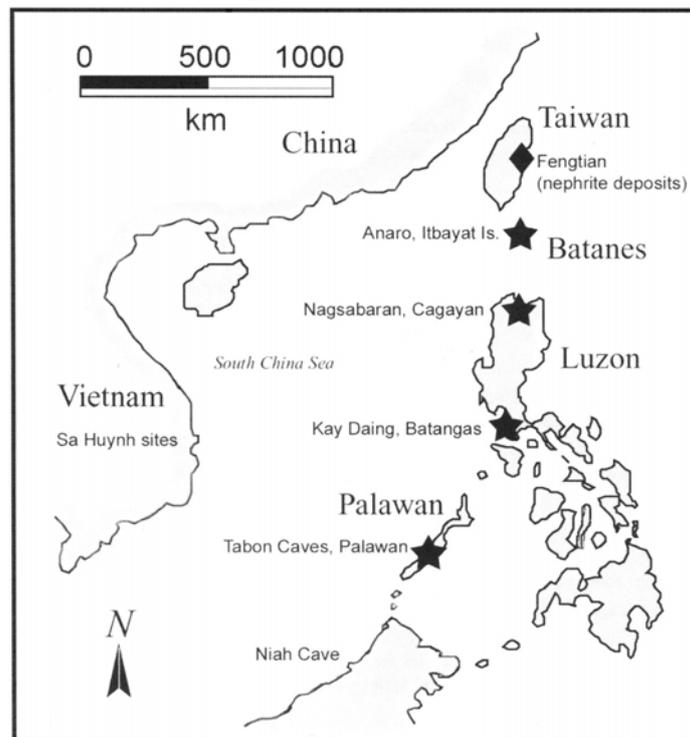
此種遷移型態主要在尋找與原有居住地區相同的生態區位，就台灣本島而言，西南海岸平原地區大幅度擴展恰與上述聚落變化相關，因此可以得見聚落逐漸順著海岸平原擴張，繼續向海岸地區遷移。至於中北部的海岸平原並未大幅擴張，人群雖可隨著海岸平原擴張居住，但範圍並不廣大，因此可見人群循著海岸尋找相同生態區位的空地遷移，東部海岸與恆春半島亦有類似情形，因此海岸地區可見一連串聚落隨著海岸或河口擴張，甚至連東南海上的蘭嶼、綠島均可得見繩紋紅陶時期人群移居。這些遺址所在均與大坌坑文化晚期以來人群所熟悉的海岸平原與鄰近地區相同，從遺址反映的資源利用也大致相同。此一階段人群不但沿著台灣本島擴張其領域，同時也順著台灣本島東側的島群，以黑潮洋流所構成的交通動力，向南遷徙到巴丹群島與呂宋島北部地區，定居形成新的領域與文化體系。

(2) 移居不同生態區位適應

除了尋找相同區位之外，繩紋紅陶時期人群另有移居不同生態區位的適應型態，北部訊塘埔文化在淡水河口與北海岸地區，人群從海拔較低的海階往海拔較高的海階分布，並順著台北盆地面、淡水河系各支流向中游遷徙，甚至在宜蘭地區順著蘭陽溪向溪流上游遷徙翻越分水嶺到達海拔 1,700 公尺大甲溪上游山區建立聚落。中部牛罵頭文化的人群一部份聚落順著溪流遷徙到溪流中、上游地區，例如頭前溪流域的沙坑村遺址，後龍溪流域的苗栗龜山遺址，景山溪流域的三櫃坑、六份坪遺址，大甲溪流域的中冷遺址，大肚溪流域的草屯平林、大馬璘、水蛙堀遺址，濁水溪流域的洞角、Lalu、豐丘、東埔一鄰遺址，南部牛稠子文化也有部份人群順著溪流向山區遷徙，例如曾文溪流域的山美遺址，旗山溪流域的二坪頂遺址，荖濃溪流域的烏巴客遺址。至於東部地區的繩紋

紅陶文化人群，由於海岸平原並不寬廣，因此人群除了在海岸平原移動以外，也從大坌坑文化晚期開始深入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的縱谷地區，例如平林、阿多莫遺址，部份人群並移居至中央山脈東側山麓較高的緩坡地，例如台東平原邊緣的老番社遺址。上述這些遺址都已離開海岸平原地帶，深入丘陵山地地區，取得海岸資源並不容易，因此發展出適應丘陵山地地區的生活型態自不待言，這可以從遺址中出土大量開墾山林從事農耕的石斧、石鋤顯現，不過山區遺址的規模較小，文化層堆積較薄，可能顯示居住時間較短與人口數量較少。

此種遷徙型態在海域的部份，不只是一次向南遷徙，而是數千年來反覆往來的交通型態，此種交通型態構成了文化的互動影響與變遷，甚至存在在族群口傳的祖先來源體系，以北海岸與東海岸原住民族群為主的 Sanasai 傳說體系，特別可以說明此一人群互動往來的可能。詹素娟女士曾經以 Sanasai 傳說體系構成的傳說圈作為研究主體，說明廿世紀初流傳於凱達格蘭、噶瑪蘭以及阿美族等幾個原住民社會，以 Sanasai 作為祖先的起源地，藉由 Sanasai 傳說為中心，指出這些人群之間彼此的關係，凸顯海岸地帶區域族群的特性，說明這些人群的動力來自於黑潮洋流（詹素娟 1998）。



以台灣玉所製造的玉器與廢料出土地點為例，經過年代比較可知史前時期人群可能的移動方向，大致從台灣向南沿著南海海域擴散（原圖引自 Yoshiyuki and Hung 2005:60，經修改）

（二）台灣歷史的考古學研究觀點

不管一部台灣的歷史要從何寫起，文字書寫的歷史和考古發掘所顯示的結果的確可以說明歷史更完整的面向，單從此次歷史學者對於新港文書等文獻的既有研究成果，和考古學研究成果共同來看，就可以發現只有在中央研究院這樣的多學科存在的學術單位，才能從不同的角度完整說明歷史的面向。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年來在台灣進行考古工作的收穫，可以從十三行遺址的發掘與研究說起，也可以從台南科學園區內的大規模考古工作說起，但是這些研究都是史前時代的研究工作，契合的研究方向是南島系民族的遷移與早期歷史，追索的目標在於一個海洋民族的傳佈與流變，不過這不是史語所考古學門唯一的研究方向，從 1980 年代開始就以考古學方法研究台灣歷史時期的文化與變遷，考古學者逐漸從唐宋階段漢人在澎湖拓殖，進入思索台灣本島文字歷史階段。此次選擇史語所同仁在台灣南部的考古工作，說明歷史時代考古的發現與重要意義。

考古學門的同仁在台南附近與其他單位合作發掘的熱蘭遮城遺址與社內遺址，恰可說明十七世紀台灣歷史中不為人知的一頁。熱蘭遮城是一處台灣歷史開端的重要行政與商業中心，社內遺址是台南近郊的一處原住民新港社的所在地，透過考古的發掘，二者之間具有明顯的聯繫，足以說明十七世紀台灣在世界歷史中的意義，以及當部落碰到國家時從物質文化所呈現的特殊意涵。

熱蘭遮城遺址在 2003 與 2005 年先後進行兩次，在城內總計發掘七個探坑，238 平方公尺面積，考古發掘所揭露的地下世界，以其豐富的遺構與遺物，敘述了一個與歷史文獻史料相互呼應又彼此補充的城的故事。連結各探坑出土遺構，初步得知荷蘭時期至日治時期的文化層分布概況，以及一些重要遺構現象，例如第二號探坑的日治時期排水設施、第三號探坑荷蘭時期的擴大基腳磚牆結構、第五號探坑荷蘭時期的黃土磚排水溝與鈍角形式的城牆遺跡。文化遺物，包括陶瓷、玻璃、金屬、石質遺物、貝器、骨器等日常生活與建築遺物，另有貝類、獸骨、魚骨與鳥禽等生態遺留。種類豐富的陶瓷遺物出土數量最多，十七世紀製品包括來自中國景德鎮窯系俗稱「卡拉克瓷」的貿易陶瓷殘片與福建漳州窯系的製品、荷蘭馬約利卡（Majolica）系陶瓷、德國萊茵（Rhineland）地區窯場俗稱鬍鬚男（Bartmannskrug, Beardman）的鹽釉陶瓷，以及來自日本九州肥前地區的唐津燒。這些珍貴器物在台灣都是首次正式出土，不僅為十七世紀歐洲陶瓷傳入亞洲的路線提供了一個新的出土地點，熱蘭遮城所見以中國陶瓷為主軸但亦包括部分來自日本和荷蘭等國陶瓷的組合特徵，正是利用考古資料來印證文獻所載當時以台灣為據

點的東亞貿易交流的具體例証。簡言之，透過遺構與文化遺物的分析，將可探究荷蘭時期城址空間分布、建築基礎所在地與生活面，理解不同時代城址的空間使用演變與人群的生活內涵。這些資料反映了從史前時代過渡到歷史時代初期台灣歷史角色的轉變，也說明了一個新的交換與貿易階段在台灣發生。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各項遺物，顯示荷蘭人與鄭氏家族以此為根據地所轉運的各項貿易物資。

西南台灣最重要的原住民族是俗稱為四大社的西拉雅族，其中與荷蘭人接觸最早的是新港社，此次因應台南科學園區的需求，本所同仁在原為新港社舊址的社內遺址，發掘了 1052 平方公尺，獲得了大量的考古資料，其中最明顯的證據是和原住民自己製造的遺物一起出土的外來物質遺留，其中出土的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安平壺、青花瓷、釉上彩瓷與黑褐釉硬陶器，應有部分是由荷蘭人與鄭氏家族所輸入，清楚的說明了從荷蘭人與原住民社會的互動關係，也充分表現了熱蘭遮城是十七世紀台灣西南海岸重要的轉運站。

四、從台東檢討的史前文化觀點

從現在發現的遺址分布情況而言，奇萊平原及縱谷地區的遺址很少，主要的原因當是調查工作不足。由於整個東部地區目前發掘的遺址仍然不多，尤其是北段的花蓮縣境內。而且詳細的遺址陳述報告也很少見。再者除了卑南遺址之外，其他遺址的碳十四年代仍嫌罕見，因此在討論新提出的史前文化層序時，深覺有許多缺環以及無法解釋的疑問，所幸近年來新研究的遺址都已經有了較為詳細的年代，例如舊香蘭遺址、哈比遺址等。未來希望在新資料持續出現以後，能夠繼續提案修改，使得這個史前文化層序更為完整。就目前東部地區的史前文化而言，有幾個觀念需要提出檢討，以下說明個人意見。

（一）遲滯與地方性演化

這二個課題在台灣考古學研究中頗受關注。宋先生即曾對長濱文化的遲滯問題進行過探討；之後，李光周先生更是明確的指出長濱文化在更新世結束後、全新世的那個階段，其文化內涵應該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遲滯因素。但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是自然資源的豐裕、文化本身的特質抑或是文化隔絕的效益，應該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深思的課題。

至於地方性演化的課題，以卑南文化的來源問題為例，雖然學界對於張光直在一九八〇年代前後所提出的亞洲大陸東南沿海傳到台灣的“傳播論”見解，持有高度的重視，但是筆者仍認為基本上卑南文化的來源，應該與地方性演化有直接的關係（劉益昌 1990、1996）。其實台灣的史前文化中產生地方性演化的現象十分的普遍，除了臧振華、李光周對於繩紋紅陶的研究為其中的一個例證外。卑南文化晚期，其文化的涵蓋範圍更是擴及整個東部地區，如海岸、縱谷、平原、甚至山地地區均可發現卑南文化不同的地方類型所展現的不同適應型態；如漁場南、紅葉、老番社、掃叭以及公埔遺址亦均有類似的現象。至於造成這種地方性適應型態的原因是否與生業型態相關，亦或有其他的影響因素，則有待往後進一步的探討才得以窺知。

（二）移動方式的變遷

過去東台灣在整個台灣的位置被稱為“後山”，但是基本上這是基於主流人群移動方式的概念才有的稱謂，由於漢人尚喜陸路，所以自西海岸攀越中央山脈至東台灣非為易事，因此才有“後山”之稱。繩紋紅陶人的移動是沿著海岸線遷徙的，這可以從繩紋紅陶遺址的分布得以證實（臧振華 1990）。筆者認為更早的大坌坑文化晚期就已經有類似的現象（劉益昌 1992、2007）。直到繩紋紅陶文化晚期，大約距今三千七、八百年左右，這個文化的人群開始往中低海拔不同生態區位的區域遷徙。至此，史前人類的移動方式開始產生巨大的改變。東部地區尤其到了卑南至靜浦文化的階段，變化更為迅速及普遍。除了早年長濱文化可能採用陸路，Lobusbussan 文化專擅海路交通之外，卑南文化人除海路之外，也透過陸路擴散其文化的分布及影響範圍，所以如花蓮平林遺址以及埔里大馬璘遺址的發掘，都可以進一步對這個課題作更深度的探討。

（三）文化的互動方向

從繩紋紅陶開始，甚至大坌坑文化時，文化的互動似乎是從南、北兩個區域開始，而於中部會合。所以從東台灣考古遺址的調查，可以發現有沿著河川向上分布的情況，或許即為史前人類南北向文化互動的結果。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卑南文化上山活動時，東、西的交通即已開始；到了三和類型、富南類型、普洛灣類型區域的分布狀況，即可隱約窺知。附帶一提的是，其中的普洛灣類型應該是資源採集的結果，文化的互動配合生業型態的研究，或許對於釐清史前文化的遺址內涵會有一番新的突破。

（四）儀式性與日常生活

首先從東台灣“神秘”的巨石文化切入，它的神秘性應該跟祭祀行為有關。這個見解反映到李坤修對於卑南文化實用陶器的研究，則有更進一步的說明。李先生認為卑南文化日常生活及陪葬使用的陶器，分屬為二個系統。至於陶器形制的變化，則以儀式性的陶器，其形制基本不變；但是日常生活使用的陶器由於必須因應功能性的需求，所以器物的形制基本上會有所更易。這種現象在東台灣史前文化中尚屬特例，可說是考古學研究中頗為重要的一個課題。

（五）交換網絡與影響圈

台灣史前文化主要包括有橄欖石玄武岩、玉器及鐵器等三種類型的交換網絡。新石器時代中期或稍早，台灣西海岸的中南段出現以橄欖石玄武岩為主要交換物的石器交換網絡，而以牛稠子文化的澎湖地區為中心。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則出現以卑南文化為中心的玉器交換網絡，同時期大約有二百個遺址均發現有玉器的出土，其中以花蓮平林遺址與卑南遺址的關係最為微妙；根據玉器出土的類型，我們可以說前者應該屬於玉器的製造工業區、而後者則屬於玉器使用的主要地，二者形成了一道臍帶狀的關係網路，對於研究臺灣史前文化的交換體系，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最後到了金屬器時代，則出現了以十三行文化為中心的金器及鐵器的交換網絡，其與東部地區的交通關係，亦為重要課題之一。

交換網絡的形成不免造成其中某些文化的擴張，如埔里大馬璘、水蛙窟遺址及仁愛鄉曲冰遺址，均可謂受到如此的交換網絡之影響；其他諸如造成人群遷徙、物物交換的行為模式，應該都是必須注意的問題。

五、進一步的研究思考

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大坌坑文化演變而來的台灣南島文化體系，是一群擁有多元文化的族群。這些具有多元性格的複雜族群，其實和明代以來從亞洲大陸東南沿海向外擴散的閩南人、客家人一起形塑了今天台灣人和台灣文化的性格，我們不但擁有東亞大陸農業文明的性格，也擁有以島嶼東南亞和太平洋作為生活天地的南島海洋文化性格。今天追溯台灣文化形成的過程，我們不免要認真思考除了漢文化以外的另外一個源頭，那就是南島文化祖先的大坌坑文化，而這個文化可能也是當今世界廣布於海域的南島民族的

祖先。

就文化的複雜與長期發展的角度而言，從考古學的研究未必能完全解決這一複雜的文化發展體系，也未必能理解台灣人群重要組成部份的南島文化發展過程。未來勢必結合語言學、生物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地理學、歷史學等不同的學科組成南島文化研究的團隊，才能從時間的縱軸與空間的橫軸仔細剖析此一六千多年發展歷史橫跨太平洋、印度洋的海洋民族。

就考古學而言，我願意說針對每個相關的區域進行更為細緻的時空架構體系建構，進一步研究其文化內涵以及人與環境之間互動關係體系之建構，如此才能進行真正的比較研究，不至於各說各話。當然與其他學科之間的互動與理解，甚至組成針對南島民族來源之研究群，也是學術單位積極研究之所必須，就各位仍然在學的同學而言，學術研究是需要積極培養的特殊興趣，不論從各種不同的學科出發，都可以考慮「南島民族來源與演變」這一個在全世界都是學術界高度關切的課題。

再就台灣歷史的研究而言，張光直先生在 1986 年鼓吹成立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時，曾經愷切提到台灣文字紀錄歷史的時間很短，必須依賴其他非文字資料或田野蒐集的非文獻資料，考古學恰好扮演了其中重要的角色與地位，未來考古學者應該為共同建構一部完整的台灣人類活動歷史而努力。

最後，我必須提出的是：那麼一部台灣的人類活動史，或者一個地區的歷史要從何寫起，我給自己的一個回答是以土地為基礎的自然人群互動史，畢竟土地是定著的，人群是可以遷移的，只在於你怎麼看待這塊土地，因此我建議大家用不同的眼光看台灣，凝聚共同的歷史記憶，重拾土地和人群的對話。

參 考 書 目

鹿野忠雄

1946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一卷，東京：矢島書房。

1952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二卷，東京：矢島書房。

鹿野忠雄著，宋文薰譯

1955 《台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宋文薰

1969 〈長濱文化——台灣首次發現的先陶文化（簡報）〉，《中國民族學通訊》9:1-27.

1976 〈台灣東海岸 巨石文化〉《 》6:143-157.

1980 〈由考古學看臺灣〉，《中國的臺灣》:93-220，陳奇祿等編，中央文物供應社，台北。

1981 〈關於台灣更新世的人類與文化〉，《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灣，臺北

1986 〈台灣東海岸 考古學〉，《東南 考古學會會報》6，東南 考古學會。

宋文薰、連照美

2004 《卑南考古發掘 1980-1982》，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李坤修

1987 《卑南文化實用陶容器之分析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臺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計畫期末報告》臺東縣政府文化局委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之研究報告。

2006 〈臺東縣舊香蘭遺址搶救發掘及其重要的發現〉，《臺東文獻復刊》12：17-47.

李坤修、葉美珍

1995 〈臺東縣卑南鄉富山遺址 1994 年試掘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5：33-94.

2001 《臺東縣史史前篇》，臺東：臺東縣政府。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1957 〈台灣東海岸卑南遺跡發掘報告〉，《農林省水產研習所研究報告·人文科學篇》3:47-65.

1979 《臺灣考古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林俊全

1993 〈台灣東海岸地區的海岸線變遷與史前遺址關係之研究〉《田野考古》4(1):15-32.

郭素秋

1995 《臺東縣馬武窟流域史前遺址調查與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碩士論文。

2007 《三笠山遺址與哈比遺址試掘評估報告》，景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託之研究報告。

國分直一

1981 《台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慶友社。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1935 《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台北：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黃士強

1991 〈從東河地區談東海岸史前文化及有關問題〉，《田野考古》2(1):1-30.

黃士強、劉益昌

- 1980 《全省重要史蹟勘察與整修建議——考古遺址與舊社部分》，交通部觀光局 委託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之研究計畫報告。
- 1993a 《臺東縣東河橋南北引道考古遺址搶救與評估》，考古人類學專刊第十九種，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人類系。
- 1993b 《臺東縣東河橋南北引道考古遺址搶救發掘報告》，內政部委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人類系執行。

張光直

- 1995 《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中國東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採集文化」〉（1987）。中國東南海岸考古與南島民族起源問題）（1987）/〈新石器時代的臺灣海峽〉（1989）。皆收錄於此一論文集）

連照美

- 1981 〈卑南遺址第 109 號墓葬及其相關問題〉，《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31：191-221.
- 1999 〈考古學的理論與實踐〉，《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五十週年系慶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主辦。
- 2003 《台灣新石器時代卑南研究論文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連照美、宋文薰

- 1983 〈台東縣卑南遺址發掘報告（一）〉，《考古人類學刊》43:117-136.
- 1987 《卑南遺址第 9-10 次發掘工作報告》，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八種，台北：台大人類學系。
- 1988 《卑南遺址第 11-13 次發掘工作報告》，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十二種，台北：台大人類學系。
- 1989 《台東縣卑南文化公園考古試掘報告》，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十五種，台北：台大人類學系。
- 1992 《臺灣地區史前遺址資料檔（一）》，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專刊 2，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館，台北。
- 2006 《卑南考古發掘 1986-1989》，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陳于高

- 1993 《晚更新世以來南台灣地區海水面變化與新構造運動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地質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光祖

- 1990 〈台東縣東河鄉附近遺址出土陶片之分析〉，《田野考古》1(1)：73-94.

葉美珍

- 1993a 〈臺東縣長濱鄉白桑安遺址試掘工作簡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1：30-58.
- 1993b 〈長光岩棺及長光遺址發現簡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2：95-102.
- 1997 〈台東的史前文化〉，《臺東文獻復刊》2：14-27.
- 1999 〈舊香蘭遺址出土的石板棺〉，《臺東文獻復刊》5：43-61.

- 2004 《卑南遺址與文化—概要及書目彙編》，臺東：臺東縣政府。
- 2005 《卑南遺址石板棺研究—以 1993~1994 年發掘資料為例》，臺東：臺東縣政府、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 2007 〈臺東縣貓山遺址發掘報告〉，《臺東文獻復刊》13：53-92。
- 臧振華
- 2000 〈呂宋島考古與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問題〉蕭新煌主編《東南亞的變貌》：3-26，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台北。
- 臧振華等
- 1997 《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報告》第四期，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執行研究。
- 劉益昌
- 1990 〈台灣東部地區史前文化的新資料及其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論會。
- 1992 〈試論鳳鼻頭文化的性質與卑南文化的年代〉，《宋文薰等編 考古與歷史文化(上)—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上)》：327-341
- 1996 〈台灣史前文化層序的檢討〉，《台灣考古百年紀念研討會 會議論文及工作報告》：8-1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
- 2002 〈台灣地區史前文化層序研究的省思〉，《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349-362，台北：南天書局。
- 2007 〈初期南島語族在台灣島內的遷移活動：聚落模式以及可能的遷徙動力〉，《東南亞到太平洋：從考古學證據看南島語族擴散與 Lapita 文化之間的關係》，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專題中心。
- 劉益昌、邱敏勇
- 1995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綠島史前文化調查研究報告》，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 劉益昌、高業榮、曾振名
- 1994 《國道南橫公路路線研選 文化遺址調查報告》，台北：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 劉益昌、陳俊男、顏廷仔
- 2002 《臺東縣史前遺址內涵與研究—台東平原以南及蘭嶼地區》，臺東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 劉益昌、劉得京、林俊全等
- 1993 《史前文化》，台東：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
- 劉益昌、顏廷仔
- 2000 《臺東縣史前遺址內涵與研究—海岸山脈東側與綠島》，臺東縣政府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
- Bellwood, Peter
- 2005 〈華南沿海、臺灣和南島語族的史前史 (Coastal South China, Taiwan,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Austronesians.)〉《中國東南沿海島嶼考古學研討會論文集》：1-22，連江縣政府文化局，馬祖。

Chang, K. C. & collaborators

- 1969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 No. 73

Egli, Hans

- 1972 Neusteinzeitliche Typenkreise an der Ostkuste von Taiwan *Anthropos* 67: 229-267

Hung, Hsian-chun

- 2005 〈Neolithic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Northern Luzon: The Pottery and Jade Evidences form the Cagayan Vally.〉 《南島研究學報》 1(1) : 109-133.

Hsiao-Chun Hung, Yoshiyuki Iizuka, Peter Bellwood, Kim Dung Nguyen, Be´ re´ nice Bellina, Praon Silapanth, Eusebio Dizon, Rey Santiagoh, Ipoi Datan, and Jonathan H. Manton

- 2007 Ancient jades map 3,000 years of prehistoric ex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PNAS* vol. 104 no. 50,pp.19745–19750.

Pearson, Richard J.

- 1967 The Prehistoric Cultures of the East Taiwan, Tokyo: Eleventh Pacific Sience Congress of the Pacific Science Association.

- 1969 The Prehistoric Sequence in Eastern Taiwan. 《Archaeology of the Ryukyu Islands》 Chapter 6 ·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1970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Eastern Taiwan. *Asian Perspectives* 11:137-156.

Yoshiyuki Iizuka and Hsian-chun Hung

- 2005 〈Archaeomineralogy of Taiwan Nephrite: Sourcing Study of Nephrite Artifacts from the Philippines.〉 《南島研究學報》 1(1) : 35-81.



